

唐宋之际《论语》诠释转型的动因及特点

乔 芳

内容提要 中唐以降至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中国传统经学和儒学也出现了转型发展。这一时期,《论语》诠释也实现了转型。学者们一方面对《论语》版本传抄和文字正误等问题提出质疑,甚至有勘校和修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尊崇倾向。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学者们怀疑甚至勘校《论语》,是希望廓清《论语》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误,以冀通过调整经籍,恢复《论语》及孔子思想的原始面貌,从中寻绎指导现实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疑改的终极目的是尊崇。

关键词 中唐 北宋 《论语》 经学 尊经崇圣

乔 芳,江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2013

中唐以降至北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入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至北宋时期基本定型,社会呈现出新面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经学与儒学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硕学鸿儒们为了扭转社会风气和学术走向,突破原有思想和解经方法的束缚,大胆怀疑经典,改易经传,通过“重为注解”儒家经典,为儒学复兴和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建构铺路、奠基。《论语》作为研究孔子和原儒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文本,得到唐宋诸儒的一致推重。在时代变迁和学术转型的洪流中,富有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学者们革新《论语》诠释方法,以冀“括《五经》之英华,使夫子微言不绝”^[1]。他们对《论语》版本传抄和文字正误等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相应的勘校和修改,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尊孔崇《论》倾向。站在历史的横断面上考察,怀疑和尊崇恰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向度,其实并不矛盾。

一、历史变迁:怀疑改易应时肇始

以安史之乱为标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此时,儒学受到释道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论语》诠释研究”(16BZX04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宋《论语》诠释研究”(15ZWB001),江苏大学高级技术人才启动基金项目“北宋《论语》诠释演进路径研究(15DG111)阶段性成果之一。

[1]梁肃:《陪独孤常州观讲〈论语〉序》,《全唐文》,董诰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70页。

思想的冲击独尊地位丧失,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官方经学恪守师说,无所创新,严重禁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既难以使盛唐气象常在,又无力解释和消弭新的社会矛盾,不能为转型期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与动力支撑,复儒学之独尊、济风俗之衰微便成为中唐后儒学发展的时代使命。为此,众多新型学者们摒弃汉唐注疏之学,将目光聚焦儒家义理,企求变风济俗,振衰图治。对《论语》的怀疑肇始于这一时期,《新唐书》载啖助语:“《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者。”^[1]踵其后的唐代学者们几乎均有所贡献。

许勃《论语笔解序》:“噫,齐鲁之门人所记善言既有同异,汉魏学者注集繁阔,罕造其精。今观韩李二学,勤拳渊微,可谓窥圣人之堂奥矣,岂章句之技所可究极其旨哉!”^[2]韩愈和李翱既是中唐时儒学复兴运动的理论先锋,也是实践大家。二人合撰的《论语笔解》不仅诠释方法与“章句之技”殊异,释《论》理路也有很大区隔。如《雍也》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韩愈认为“‘直’当为‘德’字之误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3]。以“直”为“德”实际上是对《论语》经文的疑改,当然也有对经文本身合理性的质疑。再如《为政》解“五十而知天命”,韩愈曰:“天命深微至赜,非原始要终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学《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知天命。”^[4]李翱的说解更为具体,其云:“天命之谓性,《易》者,理性之书也。先儒失其传,惟孟轲得仲尼之蕴,故《尽心》章云‘尽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极至之说,诸子罕造其微。”^[5]援引具有神秘性和更具思辨色彩的《易》学理论,从性理角度诠释,韩、李为首创,也开了宋儒道德性命论之先河。显然,《论语笔解》释《论》,从方法到思想都具有开创性,属于《论语》宋学之滥觞。梁启超言:韩愈治经“见解高超处”就在于“他离开旧时的训诂方法,想于诸经之中,另得义理”,其主张和注经方法“对于宋学都有很大的影响”^[6]。在《五经正义》解经思想和方法一统的学术境遇下,《论语笔解》的质疑无疑具有批判意识,体现出校勘和修正精神,为宋人从义理向度追寻圣道提供了借鉴。

与韩愈同时期的柳宗元,也是唐代后期儒学新风的代表人物。其《论语辨》上、下篇,以为:“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7]柳氏之论,属于文献考辨基础上的实证行为,既有汉儒之风,又有怀疑精神,后被宋代理学家继承。

五代十国时期,主流经学风气处于将变未变之际,官方努力维持着旧有经学典范,科举考试仍然沿袭唐代制度,背诵经文和注疏的能力依旧是当时考试的唯一重心。不过,亦有学者求新求变,对新学风的发展有相当贡献^[8]。吴越国子博士丘光庭《兼明书·论语》多有对孔安国、皇侃等人疏解的不满。举一例以明。《学而》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丘氏解曰:“皇侃曰:‘犯上,谓犯颜而谏,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颜而谏。’明曰:‘犯上,谓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长兄,能悌。即事君上,能尊法令,必不干犯于君上也。既不犯上,必无作乱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9]如此,无疑是新学风持续发展的明证。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啖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06页。

[2][3][4][5]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四库全书》第1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第8页,第4页,第4页。

[6] 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7]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0页。

[8] 冯晓庭:《宋人刘敞的经学述论》,台湾东吴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

[9] 丘光庭:《兼明书》,《四库全书》第8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二、修正变通：宋学新风绵延不绝

为维护中央集权，统一思想认识，北宋初年官方经学仍然持守汉唐注疏之学。但是绍接唐代经师，民间宋学新风涌动，并渐成风气，浩荡延绵至南宋，最终完成了儒学的复兴和新思想的建构。这一时期，对旧有经传的怀疑改易参与人数多，影响程度深，范围波及广。《论语》也不例外。

咸平年间邢昺等奉召校定的《论语注疏》，虽属《论语》汉唐注疏系统，但其中亦见对《论语》经义的变通性疏解。《卫灵公》篇“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邢疏曰：“馁，饿也。言人虽念耕而不学，则无知岁有凶荒，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是以君子但忧道德不成，不忧贫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饿，学也未必皆得禄，大判而言，故云而。”^[1]“然”字笔锋一转，正避免了圣言的绝对化，应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阳货》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邢昺言：“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畜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2]当然，邢昺的行为仅仅局限在经文意涵与世俗理性有齟齬时，并未从文献学角度提供有力支撑。

欧阳修也有对《论语》的怀疑。在《三年无改问》中，其云：

或问：“传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则未也。凡子之事其亲，莫不尽其心焉尔。君子之心正，正则公。尽正心而事其亲，大舜之孝是也，盖尝不告而娶矣，岂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则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亲者，孝乎？非孝也。故事亲有三年无改者，有终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礼，哭泣之节，哀思之心，所谓三年而无改也。世其世，奉其遗体，守其宗庙，遵其教诏，虽终身不可改也。国家之利，社稷之大计，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尧、舜之业，启嗣之，无改焉可也。武王继文之业，成王嗣之无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鲧之恶，曰俟三年而后改，可乎？不可也。凡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为其父，无改也。虽过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鲧为其父者，虽生焉犹将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纣，其死也，武王不待毕丧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鲁隐让桓，欲成父志，身终以弑，《春秋》讥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亲者，尽其心焉尔。心贵正，正则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则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门弟子记其言，门弟子死，而书写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尽夫子之云乎哉？”^[3]

孔子论孝，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论语·里仁》），似乎存有从外在表现推及内心孝亲与否的倾向。欧阳修以能否“尽正心”、能否“至公”论孝，认为舜、禹、武王等改父志而“至公”为孝，而鲁隐公欲成父志反而被杀为“私其私者”，未为孝，不认同《论语》所记。

孔子善于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式教学，常常因势利导，适时点拨，或纠偏扶正，或赞誉鼓励。《公冶长》篇：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邢昺认为“此章美子产之德。”^[4]苏轼则曰：“此言未得子产之实。盖子产虽未能与先王之教，然亦有礼法以将其爱，不可谓命无教也。”^[5]二人对此章的理解有很大出入，一者以为誉，一者以为诤，苏解是一反动。《尧曰》末章记孔子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苏轼说：“此章杂取《大禹谟》《汤诰》《泰誓》《武成》之文，而颠倒失次，不可复考。由此推之，《论语》盖孔子之遗书，简编

[1][2][4]邢昺：《论语注疏》，《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3页，第460页，第347页。

[3]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0页。

[5]苏轼：《论语说》，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3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绝乱,有不可知者。如周八士,周公语鲁公,邦君夫人之称,非独载孔子与弟子之言行也。”^[1]朱熹曾云:“苏氏疑此章有颠倒失次者,恐惑有之。”^[2]王若虚也说:“予谓东坡之说为近人情,故从之。”^[3]苏轼对《论语》既有从文献学角度出发的怀疑,也有站在世俗理性和历史事实角度的质疑。

程颐对《论语》个别字句也有疑问。如解《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其云:“疑多‘曰’字。”^[4]《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程颐认为:“当食而闻,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误分为二也”,“作三月,则于义不可。”^[5]

三、尊经崇圣:勘校寻疑的内在追求

虽然唐宋之际经师们对《论语》版本有所勘校,对个别章句意蕴有所怀疑,但是比例很小,基本局限于《论语》言语记载的真实性和版本传抄的讹讹,并没有怀疑或否定孔子和《论语》思想本身,其寻疑、改易、勘校《论语》的内在追求在于尊经崇圣。

北宋诸儒中,苏轼《论语说》对《论语》经文的疑问最为突出,但是并不影响其对孔子及《论语》思想的尊崇。《阳货》篇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去,孔子欲往,弟子子路不说。苏轼解道:“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叛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于恶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绝而已。弗扰之不能为东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则有可以为东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6]对孔子的言行持理解态度,合乎情理。在《东坡易传》中,苏轼还借助《论语》经文注解《易经》。其云:“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义尔。河图、洛书,岂足怪哉?且此四者,圣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7]借此表达对孔子和《论语》的尊崇。

苏辙释《论》亦如此。在《历代论·周公》中,苏辙言:“《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8]引《论语》考订先秦封建论,用以反驳《周礼》的封建论,说明苏辙以《论语》为信。

王安石曾治《论语》,《宋史》《文献通考》《经义考》均有著录,可惜未传。据杨新勋研究,王安石之所以重视《周礼》《尚书》和《诗经》,“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的影响,含有崇圣、尊经、复古的倾向,这和时人观念一致”^[9]。王安石弟子陈祥道注解《论语》,尊崇倾向突出。如《述而》篇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陈氏曰:“人之情,矜慎于行礼之际,其不失礼也易;优游于无事之际,其不失礼也难。‘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非夫盛德之至,孰与此哉!”^[10]言语间流露出对圣人言行绝对的理解和认同。弟子以天地日月譬孔子,宋儒也普遍以此誉孔子。如《子罕》篇“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

[1][6]苏轼:《论语说》,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3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第258页。

[2]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页。

[3]王若虚:《滹南集·论语辨惑》,《四库全书》第11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4][5]程颐、程颢:《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2页,第1145页。

[7]苏轼:《东坡易传》,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

[8]苏辙:《历代论·周公》,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8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9]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4页。

[10]陈祥道:《论语全解》,《四库全书》第1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又多能也。’”陈祥道解曰：“道德者，本也；艺能者，末也。有其本而辅之以末，则不害为君子。若事其末而忘其本，则不免众人。周公之多才多艺与孔子之多能，则多能亦圣人之所不废，而非其所先也。圣人之于天，能圆、能方、能短、能长。流之斯为川，塞之斯为渊，升则云，潜则渊，仁者见之谓仁，智者见之谓智，太宰见之谓多能，不亦宜乎！”^[1]此为宋儒对待孔子和《论语》的一致态度。

程颐对《论语》和孔子的推重无以复加，认为“《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2]，解“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曰：“‘仰之弥高’，见其高而未能至也。‘钻之弥坚’，测其坚而未能达也。此颜子知圣人之学而善形容者也。”^[3]朱熹曾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4]道出宋儒普遍的学术宗尚与现实追求。

中唐以降至北宋时期，释《论》流派不一，既有汉学系统的集成之作，也有古文家之言，更有苏氏蜀学、荆公新学和程门理学之解。学者们诠释《论语》虽学术追求各异，但相异之中蕴含着趋同性，质疑精神和发明建构一以贯之。究其原因，主要导源于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转折过程中面临的时代困境。在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经学家们通过发明经旨、抽绎经义经世致用，反映了经典诠释的现实意义及学者的担当精神。故唐宋诸儒疑经改经，是希望通过调整经籍，全面恢复六经的原始面貌，其实质是“回归”，是对上古三代的尊崇，在学术领域即表现为尊经崇圣。在当时学者们的心中，“括《五经》之英华，使夫子微言不绝，莫备乎《论语》”^[5]，“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6]。因此，诠释《论语》时校勘版本、修正文字，并非要否定《论语》及其思想，其真实意图在于尊《论》崇圣，在于通过恢复《论语》的原貌，上达圣人，以寻治世之道。

〔责任编辑：平 啸〕

The Motives f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ition in Annotation fo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Qiao Fang

Abstract: From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ese feudal society witnessed a transition and turning point toward the late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also underwent a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Analects* annotation also witnessed a transformation. Scholars questioned the errors in the private copies of *The Analects* and even made collations and amendments, while they also demonstrated strong reverence for the book.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ir questions and collations were generated from their hope of clearing away every possible error in the book, finding ideological weapons for the social changes by correct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restoring *The Analects* and Confucianism. The ultimate goal of questioning and amending is to worship.

Keywords: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he Song Dynast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worshipping classics and Confucius

[1]陈祥道：《论语全解》，《四库全书》第1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2][3]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页，第89页。

[4]朱熹：《朱子语类·自国初至熙宁人物》，《朱子全书》第18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09页。

[5]梁肃：《陪独孤常州观讲〈论语〉序》，《全唐文》，董浩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70页。

[6]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2页。